当代文化结构：美学、技术与经济

□南 帆

一些文学史的叙述之中，20世纪80年代业已成为一个专门术语。这种状况隐含两种解释：首先，这个文学段落已经功成名就；其次，这个文学段落正在逐渐退隐。“退隐”或许是一个夸张的形容，众多80年代登场的作家仍然是文学舞台的中坚。一个愈来愈醒目的事实是，这个文学段落遵从的文学观念正在遭受挑战。“伤痕文学”或者“寻根文学”的喧闹声犹在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先锋文学”“新写实”的激辩曾经火花四溅。时至如今，这些主题陆续撤出了前沿。对于“架空小说”或者“玄幻小说”，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标签形同虚设；论及动漫的二次元偶像或者“抖音”的短视频，“先锋文学”或者“新写实”只能虚晃一枪。也许，与其纠缠这些概念的纷杂含义，不如回顾五四新文学缔造的文学传统。鲁迅始终代表这个文学传统，无论是他的“呐喊”还是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事实上，文学史正在将20世纪80年代叙述为这个文学传统的最新一章。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文学传统是否还在承传？

当然，20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一些特殊征兆，只不过多数人未曾意识到另一种文化即将浮现。许多人还记得电影《少林寺》的空前盛况。邓丽君歌曲流行，金庸来访，琼瑶来访，尽管文学批评并未正眼相看，但是，大众显现了异乎寻常的激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气候之中，零星的情节汇聚为完整的故事，经济条件和舆论条件共同成熟。周星驰与赵本山南北合围，另一种美学乃至另一种文化风靡一时。作为一个理论称谓，“大众文化”是形容另一种文化的合适概念——当然，只流行于本土的版图。从21世纪之初的“超女”歌手竞赛到如今声名遐迩的“网红”，所谓的“大众文化”声势不减。“大众文化”指的是另一种文化追求与想象方式，另一种文学观念以及价值体系，另一种美学意识与美学形式，而不是暗示粗制滥造的低劣质量。批量化生产可能导致仓促和草率，但是，“大众文化”可以典雅精致、华美瑰丽，充满别出心裁的创意。即使哲学、考古、文物鉴定、疾病诊断这些狭窄的专题，大众文化仍然可以烧出一道又一道香气扑鼻的菜肴。事先几乎没有人可以预料，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居然借助《论语》这种老古董调教出时髦的明星。相对于大众文化的显赫声势，20世纪80年代文学显得寒伧、孤单、自以为是，仿佛有些怪癖，分配到的理论称谓是“纯文学”，或者以“文艺”为修饰语、带有轻微贬义的家族性概念，例如“文艺青年”“文艺片”“文艺腔”“文艺范儿”，如此等等。当代文化结构内部，“大众文化”与“纯文学”已经如此成熟，并且势均力敌，以至于可以视为两个对称的支柱。

当代文化如同一个众声喧哗的庞大流体，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科学与技术派生出诸多交错的领域。大众文化与纯文学分别汇合各种因素，构造复杂的联结、组织、互动。尽管如此，大众文化与纯文学成为明显的相对参照，各种理论描述有意无意地将对方设立为“他者”。因此，现在已经是总结的时候了——二者存在哪些迥异的特征？从传播媒介、符号体系到美学意识，这些迥异的特征相互角逐，并且带动一系列深层而隐蔽的演变。

让我们从直观的对象开始。迄今为止，纯文学依存于文字符号，纸质书籍成为运载文字符号的传播体系。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梦想是巨大的书房，众多文学经典整齐地罗列于高耸的书架。文学将最为重要的主题托付给诗或者小说，一批作家孜孜不倦地测试与开拓文字符号的表意功能。“文本”很快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词，尽管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的“文本”与现代主义的实验性写作——罗兰·巴特曾经区分过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南辕北辙。当然，人们没有理由忽略电影：陈凯歌执导、张艺谋拍摄的《黄土地》引起了广泛的惊异，然而，他们的探索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同出一源。诗或者小说的开拓如火如荼，影像符号怎么能成为迟钝的落伍者？

然而，影像符号很快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商业潜力。众多家庭拥有电视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实证明，影像符号对于多数人的吸引远远超过了文字符号，电视机负责把影像符号送入每一个寓所；另一方面，影像符号的制作与传播成本也远远超过了文字符号，无论是电影的拍摄、放映还是电视信号的发射与接收。这时，经济学终于跨出美学的巨大阴影踱到了前台。市场经济条件下，免费的午餐陆续取消，没有人锲而不舍地为影像符号无偿地支付费用。市场经济的许诺是，影像符号的商业成功可以获取极为优厚的经济报酬。文字符号与漫长的农业文明相伴而行，带有明显的手工作业特征。印刷术带动的传播革命是工业社会对于文字符号的一次重组。这不仅助长了某些大型文类譬如长篇小说的成熟，催生了书籍、报纸、杂志，同时介入现代社会的演变——“印刷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曾经是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主题。相对地说，影像符号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产物。机械对于影像符号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不可比拟的作用。工业生产的投资、效率、生产规模以及经济回报均是手工作业无法想象的。这时，美学、技术与经济之间出现了清晰的联盟。从电影、电视到互联网与手机，一次又一次电子传播媒介的革命，这个联盟愈来愈巩固。我想指出的是，现今的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与传统悠久的纯文学分庭抗礼，这个联盟构成了强大的后盾。目前为止，美学仍然在三驾马车之中担任名誉主角，但是，经济的分量显然不断增加。“大众文化”范畴之内，美学无法达标是一个遗憾的缺陷，经济无法达标将一事无成。许多场合，经济正在成为价值的首要风向标。例如，如果以简要语言介绍这个春节的哪一部电影最为出众，新闻记者不会笨拙地复述故事情节，报道只要告知哪一部电影的票房超过多少亿就说明问题了。

人们很快察觉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风格差异。许多差异不是源于美学追求，而是源于文化结构内部的不同位置。美学是超越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理想，还是市场经济辖区某种文化商品的特殊形态？观念的分歧隐约潜入各种理论表述，某些时刻可能突然浮出水面，形成尖锐的对立。“大众”显然是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共享概念。无论是流行的“粉丝文化”还是传统的命题“工农兵方向”，尊重“大众”与服务“大众”均是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如此，二者的“大众”身份指向了不同源头。“大众文化”的“大众”身份首先是消费者。不论是一个公务员、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警察、一个司机，消费是他们的共同行为。“粉丝”是带有“含金量”的称呼，不想付钱当什么“粉丝”？消费的前提认可之后，市场分析力图解决的后续问题是，为什么这一批人共同成为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消费共同体——哪些主题击中了他们，哪些形式召唤他们在消费之中证明自己，表述自己；同时，如何拍摄续集或者开发周边产品扩大这个消费共同体，如此等等。相对地说，纯文学预设的“大众”具有远为复杂的内涵。纯文学作家对于经济账本缺乏兴趣，他们心目中的大众并非市场主体，而是美学共同体。对于那些负有启蒙使命的作家来说，美学的意义包含开启民智，摆脱麻木与蒙昧；对于立志摧毁剥削和压迫体系的革命作家来说，美学的意义包含了再现底层社会的苦难，唤醒大众的政治觉悟，动员大众汇入革命洪流。当革命指向不公的财富分配制度以及财富本身时，美学的市场成功甚至令人反感。

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均是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浪漫主义时常以强大而蓬勃的主体傲视世俗社会，对于财富嗤之以鼻。怎么能因为利润而牺牲心灵自由？他们不想向守财奴或者资产阶级暴发户低下高贵的头颅。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爱情，守财奴怎么能歌唱失去的金钱？这是美学精神高蹈昂扬的时代。现代主义丧失了浪漫主义的骄傲而换上一副颓废、反讽、愤世嫉俗的表情。现代主义以玩世不恭的姿态嘲讽兢兢业业的生活，嘲讽围绕财富积累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包括市场以及法律条款。正如人们所言，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叛逆和批判缺乏政治经济学基础。缺乏经济学设计图，美学能够走多远？当然，这个问题并未在纯文学内部获得足够的重视——经济学？算了吧。

现今还有不少人以感伤的口吻回忆20世纪80年代浪漫主义的潇洒与现代主义的狂狷。然而，回忆的出现恰恰表明，另一些内容已经抵达。纯文学并未消失，可是缩小了占有的空间，成为一种——而不是唯一的——文化范式。技术与经济正在改变文化结构，试图赋予美学新的位置。美学周围若干长期遭受忽略的环节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如今的摇滚歌手登台演唱《一无所有》，经纪人会事先谈妥场租、灯光与音响的设备费用、保安与消防措施以及乐队与歌手的经济报酬。对于熟悉纯文学领域财务往来的作家来说，演唱会经济报酬的数额可能令人震惊。于是，另一种文化制造的经济传奇开始流传，传统的文学观念遭到微妙的动摇。多少纯文学作家因此改弦易辙？不论统计数据显示了什么，至少纯文学不再轻蔑地对大众文化视而不见。

当然，“另一些内容已经抵达”远非简单地为文化产品标价出售。大众文化之所以独立而强盛，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拥有异于纯文学的生产机制。纯文学时常汇聚于现实主义的崇高名义之下，再现广阔的生活图景，关注那些坚实而平凡的人生，力图从他们身上窥见历史赋予的必然命运。这是严肃而深刻的主题。“现实主义”的解释存在种种差异，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概念不包含“游戏”——历史从来不游戏。然而，当大众文化推出架空小说、穿越小说乃至电子游戏的时候，“历史”突然被赋予一副嬉皮笑脸。游戏往往将坚硬的现实置换为欲望，欲望恰恰意味着现实的匮乏。无法撼动坚固的社会等级，期待和想象持续落空，锦衣玉食的日子遥不可及，携带爱情的白马王子虚无缥缈，这时，大众文化愿意提供象征性的满足。穿越到大清王朝的皇宫担任众目睽睽的佳丽，充当众多“阿哥”倾慕的对象；化身为武功盖世的侠客，踢翻那些神气活现的恶霸歹徒……坚硬现实冷漠地拒绝的梦想，可以交付大众文化短暂地实现。从古老的武侠小说到称之为“造梦机器”的电影，这种游戏长盛不衰。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迹象是，由于技术与经济的共同参与，游戏和欲望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生产规模。

纯文学的美学意识通常是正剧，喜怒哀乐的混杂构成了经验的整体。然而，大众文化对于喜剧显露出极大的兴趣。如果说，传统的喜剧时常将严肃的主题寄寓于荒谬的整体情节与人物设置，那么，大众文化更乐于借助修辞形成喜剧片段。“段子”、小品广泛流行于电视屏幕与手机，东北腔的“哎哟妈呀”与富于感染力的笑声响彻互联网。大批电影竭力开发隐藏于日常细节的喜剧因素，甚至不惜以“无厘头”的方式强行制造笑声。传统武侠电影的风格悲壮豪迈，血脉偾张，然而，现今的武侠电影接纳了大量诙谐与嬉闹，以至于周星驰、成龙获得了大显身手的空间。也许，“匮乏”仍然是喜剧盛行的一个解释。置身于一个严肃的民族，普遍接受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观念，人们很少以无所谓的开怀大笑对付未知的生活。喜剧的盛行可以弥补稀少的笑声吗？事实上，大众文化之中过量的喜剧带来了另一个隐忧：那些人造的笑声会不会成为无聊的文化泡沫堆积在人们的视野，以至于遮蔽了另一些沉重的问题？

回避沉重始终是大众文化的固执倾向。让纯文学承担痛苦吧，大众文化只负责快乐。一个意味深长的迹象是，后现代的轻盈与碎片化正在大面积漫延。“段子”，短视频，表情包，弹幕评论，搜索引擎提供的百科知识，配上隽语的漫画，不超过140个字的微博……一些人早就公开宣称，决不看超过三页纸的文章。那些短小而深奥的诗歌恕不接待。总之，不要随随便便搬出沉重的问题扰乱午后的清梦。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歌曼舞的气氛之中，宏大叙事制造的历史总体论令人厌倦。那么，如何解释那些动辄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很大程度上，这些网络小说是众多碎片的连缀。某些时候，作家也记不住众多碎片的连缀顺序，以至于错漏与矛盾此起彼伏。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以碎片化的内容对应零星时间的碎片化阅读，错漏与矛盾算不上多大的失误。纯文学的构思始于爱情，盘旋缠绕，止于历史。可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何必如此辛苦地驾驭历史？大众文化巧妙地将这种构思颠倒过来：始于历史，盘旋缠绕，止于爱情。返回个人命运，“有情人终成眷属”，难道还有比“大团圆”更为动人的结局吗？这种漫画式的概括并不是草率地臧否所谓“碎片化”或者“总体历史”，而是试图思索一个问题：二者之间多大程度地脱钩了？

谈论过传播媒介与符号体系，人们没有理由忽略读者。当然，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称之为观众、听众或者消费者。接受美学的“读者”是一个相对“文本”的概念，抽象的读者并未配置社会学的坐标，唐朝的读者、五四时期的读者与21世纪的读者一视同仁。我试图指出现今相当一部分大众文化读者的年龄段落，涉及的是一个具体问题：他们未曾来得及投身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骨干往往来自乡村或者工厂，拥有不同凡响的生活经验，带有底层气息的痛苦与快乐烙印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之中。文学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些生活经验的回响，“现实主义”是他们不可放弃的基本气质。与其分析《黑客帝国》显示的“平行世界”，不如返回乡土社会《平凡的世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子女急速转向了大众文化。这是一代独生子女，熟知流行的动漫作品和科幻影片，闯过令人窒息的高考之后进入各种学院接受良好的知识训练，继而担任社会骨干，甚至成为执牛耳的角色。他们很少依靠一柄锄头维持自己的生活，手机与电脑显然是更为通俗的日常工具。我企图追溯的是，履历的差别多大程度地投射到相距甚远的美学趣味之上？

大众文化与纯文学可以相互交融、彼此欣赏，甚至制订战略合作计划。然而，二者的结构性差异不会缩小。事实上，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理论谱系仍在分别延长，不时爆发竞争性论战。在我看来，现在远非谋求共同结论的时候。面对论战的唇枪舌剑，人们毋宁返回更为基本的观念：这个世界遇到了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美学可以贡献什么？很大程度上，这些认识才是评判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前提。

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需要重视的几个关键词

□远 村

新时代必然会产生新生活、新气象，也必然会给诗人带来新的语境和经验。诗人一定要自觉克服旧有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惯性，不断探寻新的诗意、新的方式，积极努力以诗的激情回应新时代的召唤。将新生活的新经验和新感受用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昂扬向上的诗歌作品，是每一个诗人在新时代的使命与责任。关于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我觉得，诗人务必要重视关乎诗歌写作的几个关键词。

风 雅

毫无疑问，新时代诗歌的建设，就是要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纵观诗歌发展的历史，风与雅是我们几千年文化核心的基本特征，也是诗歌写作的重要方向，更是读者评判诗歌的审美标尺。人类在没有创造出文字之前，诗是以歌唱的形式存在的。人类依靠吟诵的方式来传递信息、交流情感，只有当文字出现并为我所用，才能把吟诵的内容记录下来。这些被文字记下来的唱词，就是最早的诗歌。人类社会进入高级形态后，文明的发展很快渗透到了诗歌中，进而有了民间与庙堂之分。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诗歌是风与雅共存并进的状态。《诗经》不仅是一部周王朝的诗歌史，也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诗经》中大量诗歌是来自民间与田野的。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稳固，诗歌渐渐被庙堂化、文人化。进入近现阶段，诗歌又是以精英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重视学习西方诗歌，对传统的继承不足。因此，我认为新时代诗歌，就是要找回文化自信，重建风雅气度，一定要精准把握国民精神与现实面貌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好诗人的政治站位和意识切入口。只有紧扣时代脉搏，关心国运民风，才能写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诗歌。

语 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键词，可以涵盖新生活的时代特征。诗歌与汉语的发展密切相关，一直以来，当下的诗歌写作处在两个语言传统中左右为难，即一个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代汉语传统，我称之为大传统；另一个是只有百年历史的现代汉语传统，我把它叫作小传统。新时代诗歌要有新面貌、新气象，诗人就一定要把握和区分两者的优劣，提纯诗歌语词的质量。众所周知，我们的文字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近邻印度，文字从诞生之日起就再未断裂，一直跟民族的诗歌发展紧密结合着，这是一个让人惊讶的传统。特别是象形文字愈来愈呈现出它的优越性，它所蕴含的信息与记忆让我们沿着来路，就能找回精神的故乡。作为一个诗人，对语词的亲近与掌控能力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的记忆就隐藏在这些优美的神秘的汉字里。诗人必须做的就是努力找到它、运用它，而不是做语词的仆人和搬运工。

想象力

想象力是诗歌创造的原动力，唯有想象，才可以让诗人保持好奇心。对我们生命本质的探索，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切莫让想象变成一堆乱麻，或者轻易放弃想象，以浅白的口语复述繁杂的生活。多年前，我去看半坡遗址，回来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感慨于祖先超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几千年过去了，从思维的角度，我们的想象还没有能够完全超越祖先的器物。多年来，诗歌写作者常常以各种理由拒绝承认想象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性，不曾过脑走心的浅表达和口水诗随处可见，极大地影响了诗歌表达的有效性和时代高度。所以，我以为想象力的匮乏与有意回避，是诗歌平庸化与低能化的主要原因。进入新时代，诗人要为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鼓与呼”，就要调动和开发想象力，不断锤炼诗歌语言，努力开拓诗歌的社会广度与思想深度。只有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诗歌，才能回应新时代的召唤，写出一个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新篇章。

融 会

各种文化的交融，使人类走得越来越近，同时也获得了文化的新生力量。今天的汉文化，正是这块古老土地上各族群持有的不同文化相互交融与渗透的结果，诗歌的发展也是如此。作为新时代的诗人，一定要有世界视野下的气度与浩阔，还要有本土观念的强大与坚守；既要有关注东方大地上风景的自信，还要有足够的能力接受扑面而来的外来文化；既要研究当下的中国诗歌，还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典诗歌，更要横向正视各国文化的变化与交融。只有把我们的写作放在全人类的视野中，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民族与时代的伟大诗篇。

清华大学举办“文学之夜”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作为清华大学校庆11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4月17日，“清华文学之夜”系列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活动包括“清华园里的作家们——我的清华文学记忆”研讨会、“清华园里的科幻写作”交流会和“朱自清文学奖（2020）颁奖典礼”等内容。

“清华园里的作家们——我的清华文学记忆”研讨会邀请李朱、唐城、兰荪、姜涛、向祚铁、徐晨亮、叶扬、陆楠楠、陈瞰、林培源、唐沨、钱浩等12位诗人、作家，追忆各自在清华园的阅读写作经历，梳理出从1980年代迄今的清华文学脉络。大家表示，校园里的文学社团为写作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因文学而结缘的社员们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不同学校之间的文学交流更加便捷，助推了校内外广泛交流的网状文学生态的形成。

“清华园里的科幻写作”交流会邀请了潘海天、江波、查杉、梁旋、郝景芳、陈梓钧、修新羽、宋婷等8位科幻作家、艺术家参加。与会者回顾了与科幻结缘的经历，以及“科幻文学创作”“天文学导论”等对创作生涯有深刻影响的课程。大家谈到，课程的具体内容可能已经有所模糊，但从中获得的认知持续启发创作。大家也谈及创作上的困难与挫折，回顾了理想受挫、与压力对抗的经历，希望同学们以勇气和信念鼓励自我，坚持追梦。

在“清华文学之夜暨朱自清文学奖（2020）颁奖典礼”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孙明君等分别致辞。此次朱自清文学奖以“疫情下的人文省思”为主题进行征文，共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和鼓励奖4名。何青翰的随笔《未尽的生活——在美国疫中的笔记》获一等奖；张瀚文、谢廷玉的论文《何以超克数字治理时代的自我宰制》，胡蓉蓉的散文《鄂西小镇》获二等奖。

冯放个展探讨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本报讯 4月18日，由北京电影学院当代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美术学会当代画院、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今日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殇”冯放个展在今日美术馆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锋任策展人，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集中展示了艺术家冯放近年来以“鹤”和“候鸟”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展览开幕当天还举办了主题为“用一场十年的艺术行动，照见当下与你我”的研讨会，专家学者围绕冯放的创作、艺术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艺术家在当下的社会责任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冯放经过多年在视觉领域的历练，后回归绘画和当代艺术创作。因为喜欢鹤，他对鹤展开深入研究，并由鹤的濒临灭绝而关注整个候鸟生态。2012年，他资助并参与了一部记录候鸟南迁的纪录片拍摄，候鸟被捕杀的惨况令他震惊。此次当代艺术展呈现了冯放对该事件关注追踪近十年的感受，表达了对后疫情时代人与自然关系、人类社会现实的思考。他表示，期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唤起社会认知，为保护自然生态尽绵薄之力。“你、我、它如何相处？或许是当下最迫切的提问。”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17日。 （王 觅）

聚合青年创新力量 共绘未来创作图景

本报讯 如何突破原创戏剧创作的壁垒，推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是近年来戏剧创作者不断探索的重点和难题。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支持下，4月6日，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新剧本》杂志承办的“青年编剧人才培养计划”在京举行，旨在为北京乃至京津冀地区发掘和扶持戏剧创作人才、发挥首都文艺资源优势、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当天，李东、冯俐等专家分别为学员们授课，小说家双雪涛和编剧史航展开对谈，项目首日线上直播观众即突破30万人次。

“青年编剧人才培养计划”项目面向京津冀地区招生，收到百余份申请，经过严格评审，共招收20名学员，分别来自国有院团、高校、研究机构、民营院团以及新文艺群体，其中新文艺群体学员比例过半。项目采用“线上+线下”的模式，“线上”部分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全程直播授课过程，“线下”部分通过集中授课方式开展戏剧创作培训，邀请在影视、文学、传媒行业颇有建树的专家，以讲座或对谈方式分享创作心得，扩展学员创作面向，提升学员创作素养。此外，6位导师分别与20位学员进行一对一的课程辅导，帮助学员完善剧本内容结构，完成剧本创作。在集中教学和创作剧本之余，48小时编剧速记式创作工作坊将让学员体验紧张而有趣的创作过程，使大家互相配合完成剧本的创作和演出。 （欣 闻）